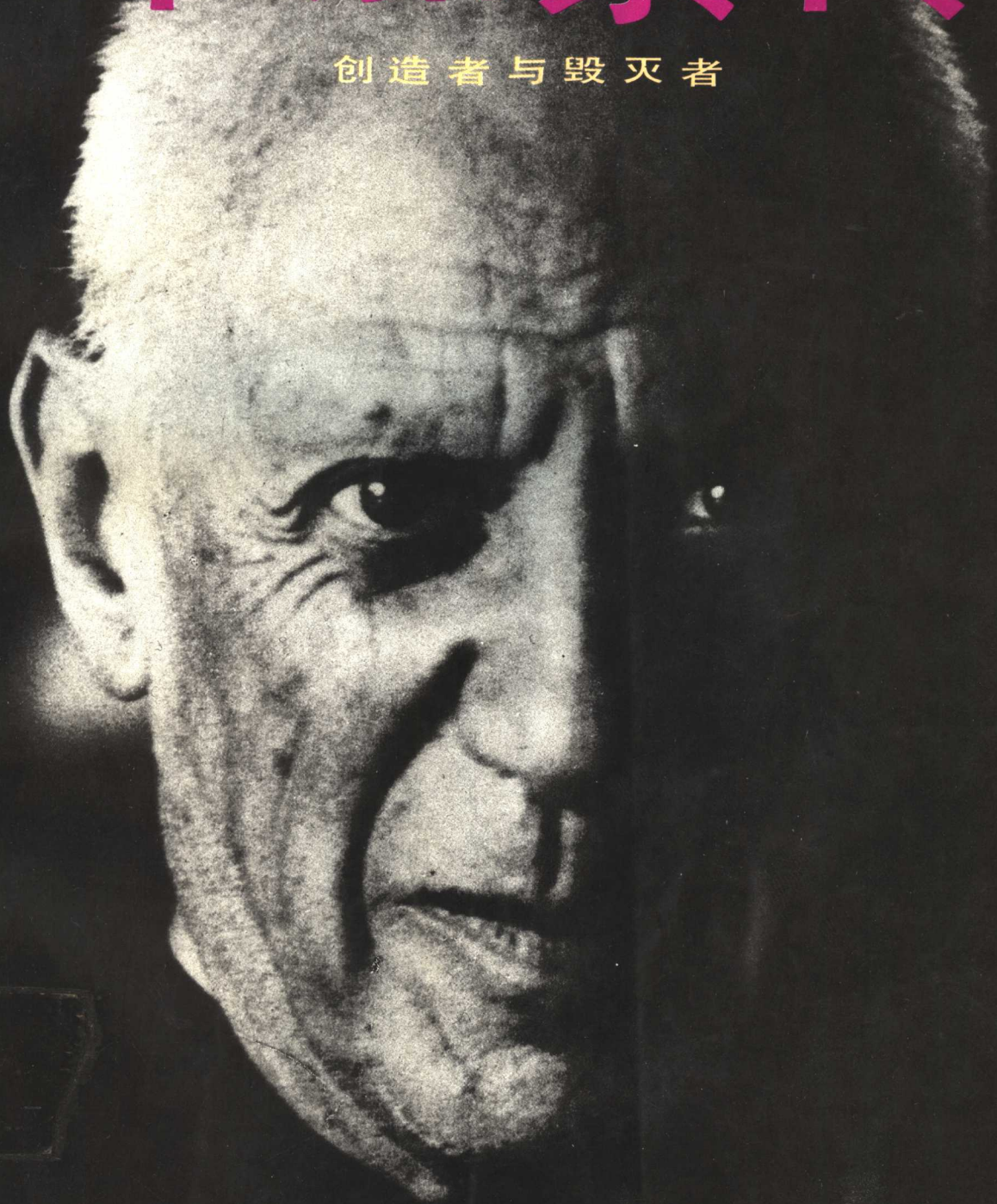


毕加索传

创造者与毁灭者



(美) 阿莲娜·S·哈芬顿 著

毕加索传

创造者与毁灭者

(美) 阿莲娜·S·哈芬顿 著
弘鉴 田珊 光午 月贞 译
王宏建 校

人民美術出版社

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

(美) 阿道夫·S·哈芬顿 著

弘鉴 田珊 光午 月贞 译

王宏建 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刘玉山 田珊

装帧设计：董雨辛

工程兵机械学校印刷厂印刷

人民美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102-00800-7/J·730

定价：精装24元、平装12元

中文版序

毕加索这个名字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很熟悉。本世纪初,他创作了震惊世界的《亚威农的少女》,用他的画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在二次大战前创作的巨型壁画《格尔尼卡》,是记录战争灾难与人类悲剧的艺术丰碑;他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的《和平鸽》更是飞遍了全球,飞进亿万人的心中。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最高权威和泰斗,一生都在不倦地探索、创造、开拓,他创作的数万件油画、版画、素描、雕刻及陶塑等,如今仍倍受人们的青睐。据世界艺术市场的一份资料统计,迄今为止,全世界售价最高的10件艺术作品中,有一半是毕加索的。〔注〕于是,享有非凡盛名和极大声誉的毕加索也就成了人们喜欢议论的话题。

但是,毕加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恐怕并不是人人都能真正了解的。他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复杂的,他的思想是复杂的,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他的艺术也是复杂的。要想真正了解这样一位复杂的艺术大师,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有关毕加索的许多评论往往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复杂性,因此也就很难避免片面性。有人把他看作是超凡的天才,却攻击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信念;有人称颂他对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贡献,却又不承认他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也有人热衷渲染他私生活中的风流韵事,把性爱说成是他艺术创造的唯一动力;还有很多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们,把他的经历描绘成一部传奇故事,将他神化,使他可望而不可及。这样,人们所知道的毕加索,就往往是一个片面的、分裂的、矛盾的和神秘的毕加索,远不是实际生活中的毕加索了。

美国女作家阿莲娜·S·哈芬顿的新作《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在众多有关这位伟大名人的传记著作中算是别具一格、不落窠臼的。这本书于1988年7月在伦敦出版发行,是当年英国最畅销的图书之一。在此之前,其中的一少部分内容已先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在西方引起震动。英国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88年7月3日)曾发表长篇小说

〔注〕截至1989年底,世界上价值最高的艺术品是:1. 凡·高:《鸢尾花》(5,130万美元);2. 毕加索:《皮埃特的婚礼》(4,890万美元);3. 毕加索:《自画像》(4,790万美元);4. 凡·高:《向日葵》(4,200万美元);5. 毕加索:《灵活的兔子》(4,070万美元);6. 毕加索:《杂技演员与少年》(3,760万美元);7. 莫奈:《草原上》(2,430万美元);8. 毕加索:《母性》(2,210万美元)。

评。说“该书将彻底改变世人对毕加索其人、其生活、其艺术的看法，使被神化了的毕加索还原为一个真正的毕加索”。

那么，这本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毕加索呢？读者将要看到的毕加索，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并带有悲剧色彩的伟大艺术天才，一个创造者和毁灭者，一个20世纪的见证人。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据这本书说，当他还在呀呀学语时，就懂得使用绘画语言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四岁开始学画，九岁时的素描就已像成人艺术家的那样技巧娴熟。他一生保持着永不衰竭的多产能力和超凡的独创力与想象力，一生都在追求和探索。他先后经历了蓝色时期，玫瑰色时期，立体主义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超现实主义时期……本世纪美术史上各个重大的时期几乎都和他的创造分不开，都接受了他的引导或影响。他是现代派艺术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

他又是一个天生的十分奇特的叛逆者。他反叛那个衰败的时代、腐朽的社会，反叛传统的道德、传统的艺术，反叛父母，反叛朋友，反叛一切……他是无神论者，但心灵深处又潜藏着某种原始的迷信观念，相信某种符咒和巫法。他生活豪放不羁，年青时穷困潦倒，成名后拥有亿万家财却视金如土，依然保持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穿一身条绒衣服，不修边幅，还常常光着上身工作或出现在公众场合。

他热爱女性，他的艺术和生活都离不开女性。他大胆追求自己爱恋的女性，对她们有着海一样的真挚和火一样的热情。他一生先后同七个女性长期共同生活（其中有两个是正式的妻子，五个是情人），她们的形象反映在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但他又是一个性追猎者、性变态者、性虐待狂。他从十五岁就出入妓院，成年后与数不清的女人有过性关系。他像西班牙传说中的唐·璜和印度神话中的诃里什那（牧牛神），对异性有着神奇的魅力，使她们聚拢在他的身边，拜倒在他的脚下。他则在生活中和艺术中蹂躏她们，毁灭她们。他把对性的探索看作是一件正经的事，并把这种探索表现在他的艺术中，也表现在他的生活中。

同时他又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巴黎解放后不久，他便不顾资产阶级社会的非难和议论，毅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声明说：“加入共产党是我的一生、我的工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在理解和铸造整个世界方面，在帮助今天或明天的民众，使他们更为头脑清醒、更为自由、更为幸福方面，难道不是共产党干得最为出色吗？”他对资产阶级桀骜不驯而且狂妄乖戾，但能虚心接受法共中央的批评。他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共产党处于困难时期表示决不退党。他热爱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憎恨侵略战争，他的《格尔尼卡》、《朝鲜的屠杀》、《战争》与《和平》都是美术史上的名作。

他是这样一个矛盾、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创造，一方面毁灭。他的艺术记录了这个世纪的动荡、灾难、愤怒、迷惘与幻灭，他的一生都是与这个世纪的命运紧密相联、休戚相关的。他从早年的失落、彷徨到晚年的孤独、苦闷，始终带着这个世纪的悲剧色彩。他活了九十二岁，是世纪的见证人。

以上就是这本书为我们描绘的毕加索。无疑，这种描绘是多层面的、立体化的，因此也就更为接近真实。而且，由于作者的文笔生动，它刻划的毕加索便跃然纸面。

但是，我们的读者或许会问：难道真实的毕加索就是这样的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毕加索研究中引起了极大反响，而且造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它的支持者包括毕加索的情人弗朗索瓦丝、女儿玛雅、律师、司机以及他生前的许多亲朋密友。他们认

为，这本书是所有关于毕加索传略中最真实的一本。美术史家詹姆士·洛德（James Lord）认为 这本书为世人描述了一个真实的毕加索，有史料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毕加索的生前好友和美术史家持反对态度。如美术史家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就认为此书是本“否定的作品”，是一部“充满怒气的性生活史”。毕加索的另一个女儿帕罗玛也不喜欢这本书，但她没有否认书中所列举的事情的真实性。约翰·理查森还准备写一部多卷本的《毕加索传》，为毕加索“辩护”。

我们无法知道理查森的《毕加索传》将会为我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毕加索，因为它还没有问世。但哈芬顿的《毕加索传》已经把毕加索的形象展示在我们的眼前：创造者与毁灭者。这个形象当然是哈芬顿笔下的形象，既有客观的根据，也有作者主观的认识和情感。

作者阿莲娜·S·哈芬顿是当代一位颇有盛名的传记作家。她1950年出生在希腊，十六岁移居英国，不久入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1971年被选为著名的剑桥联合会的主席。她的处女作《女性的妇人》出版于1974年，被译成十一种文字，从而一举成名。她的第二本书《追随理性》出版于1978年，是一部政治与文化的论著。她的传记著作《玛丽亚·卡拉斯：传说后面的女人》出版后，很快就风靡全世界，成为畅销书。她还是《希腊诸神》的作者，该书把希腊的神祇描写为“带领人们到生活与被忘却了的方面去的向导”。大约八年以前，哈芬顿在她的写作计划中选拟了三位世界名人，莎士比亚、莫扎特、毕加索，最后决定为毕加索立传。为写这本书，她曾用五年时间先后走访了毕加索的生前好友、子女、律师、管家、司机和情人，并走遍了所有毕加索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得到了数百人的协助。她还阅读了数百篇有关毕加索的文章和著作，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由此可见，作者的写作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她尊重客观的事实，是在占有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开始写作的。

从主观方面来看，哈芬顿对毕加索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评价、褒贬与爱憎。她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究了毕加索思想性格形成的历史、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哲学等多方面的原因，揭示了本世纪初欧洲动荡的社会对早年毕加索及其日后艺术的影响，资料是翔实的，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毕加索的政治信仰、社会活动及艺术观念的分析却根本缺乏力量，而且带有偏见。

另一方面，作者又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深入到毕加索那个隐密的内心世界探索他的灵魂和潜意识。哈芬顿通过对毕加索与七位女性的性爱关系的描写，发现了一个新的、不大为人所知的毕加索，并把这个毕加索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加以鞭挞，暴露出他的丑恶，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可悲、可怜、可爱、可敬的毕加索。若说这本书是“否定的”、“怒气冲冲的”，未必十分中肯。要之，作者对毕加索有贬有褒、有憎有爱，但根本的态度却不是批判的，更不是要抹煞这位伟大艺术家天才的一生。作者的根本态度是探求真实，是要揭开蒙在毕加索身上的层层神秘的传奇外衣，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读过全书之后，我们的读者或许会发现：作者哈芬顿对毕加索的爱和敬仰，并不亚于毕加索的盲目崇拜者和追随者。她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同毕加索一道“经历了一次感情的波涛”，她本想站在局外纯客观地叙述，但她做不到。因为在她的心中，毕加索不是神，而是一个有缺点但又有血有肉、可亲可爱的伟大的人。

当然，哈芬顿对毕加索灵魂的研究，特别是对他的某些作品的解释，也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而且对毕加索夫人杰奎琳的评价，也失之公正，这恐怕是由于她过分依赖于弗洛伊德

的学说和过多地受了弗朗索瓦丝的影响。譬如，哈芬顿对毕加索晚年的作品基本上是执否定态度的，认为它们是他双重人格和性变态在艺术上的表现，陈腐、轻率、平庸。这是有欠公允的。毕加索的探索精神其实在他的晚年表现得是最突出的。这一时期他拼命地工作，创作了大量的油画、版画和素描，许多作品反映了他在晚年回归传统并用现代艺术语言重新表现传统题材的执著的探索。就风格技法而言，毕加索晚年的作品较以往更加粗放、大胆、自由，有些作品完全是用色块堆砌而成，用笔极为随意。他在1956年创作的《画室》，也许预示了他未来近20年的艺术追求，画室中堆满了他过去各个时期的作品，但画架上的画布却是一片空白。这表明毕加索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要求不断地进取。而这，不正是毕加索最本质的精神吗？

王宏建 1990年元旦于中央美术学院

作者序言

毕加索艺术的根本特色是令人震惊。在写作本书的几年间，我一直被这种最为强烈的震惊所感动。像我这一代人的许多人一样，我从小到大，一直把毕加索奉为20世纪最杰出、最令人信服、最具独创性、最变幻无常、最有影响、最富诱惑力也最神圣的艺术家。1980年在巴黎大展览馆举行了盛大的毕加索作品回顾展，此后的一天，我漫步在巴黎街头，感到自己似乎需要以实际行动从展出的毕加索近千件绘画、素描、雕塑、版画和陶塑艺术品中汲取无穷无尽的能量。毕加索是个魔术师和巫师，有关他的传奇已成为颠扑不破的定论，然而这个传奇越传越奇，又令人感到迷惑和不安。

回顾展的两年之后，我开始着手本书的写作。在5年的时间与历数不清的惊异之后，传奇中的毕加索与我所了解的和试图在本书中所塑造的毕加索相比，似乎是个人为制造的、虚幻的英雄。我感到犹如亨利·詹姆士面对着“一颗璀璨而坚实的珠宝……它光芒四射，一隐一现；刚才还闪现在表面的光辉，刹那间又深不可见”。这个无与伦比的最富创造性的天才，刹那间变成了一个虐待狂。他一生都满怀着对绘画、女人和理想的炽热的感情，然而转瞬间，他又变成了一个不懂爱的人，他诱惑的目的不是为了爱，甚至也不是为了占有，而仅仅是为了强制地毁灭。他曾说：“我估计，我将在从未爱过的情况下死去。”

事实上，他生活的中心即处在创造天性与毁灭天性的斗争中，而这一斗争也将贯穿在本书的中心。作为一个创造者，毕加索的形迹伟大而又光荣，他的丰富的创造近乎神话。他创造的形象和想象不仅铭记在艺术世界，而且镌刻在整个20世纪。作为一个毁灭者，毕加索又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第二个妻子、孙子以及他多年的情人玛丽·泰莱丝·华尔特相继自杀，他的第一个妻子精神分裂；他的《格尔尼卡》时期的情人，一位卓越的艺术家的女儿朵拉·马尔精神崩溃——所有这些只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受害者名单中的一部分，那些受害者都为他的个性所毁灭。我和我的一位助手在巴黎、巴塞罗那、法国南部和其它地方找到了我们所能找到的在生活中认识毕加索的人，以及那些不是故意或由于不迷信传奇而将他天才的黑暗面暴露于世的人，同他们进行了数百次的谈话。通过这些谈话，我意外地，而且首先是不情愿地，发现了作为毁灭者的毕加索的大量形迹。

事实本身有它自己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但事实本身尚不能代替生活或传记。传记作者往

往通过他对主人公思想感情的认识和理解，将其一生的经历串连在一起，或有意或无意，或褒意或贬意，形成其对生活和世界的描述。我尽力完全保持自己的意识。在讲述毕加索的故事中，始终指导我的是他的一份声明，这是我在一本法文书中发现的。我翻译了它，并把它装在镜框里，作为我的座右铭，直到它的内容开始让我感到仿佛是毕加索本人在指示我：“谈论一个男人，必须像是在画他。你愈是置身其中，也就愈是保持了自我，愈是接近了真实。试图不具名，将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做得最糟的事——试图取消自我。”

我置身于他的一生中，仿佛看到他迎面而来，满怀情感，同我有一种至为亲密的关系。我完全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他凝视着，那黑色大理石般的眼睛就像他的作品一样，充满了神秘。他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吸引着我，也震撼着我；他像在他的作品中一样，也在他的生活中创造现实；他说服女人们居住在他所创造的现实中，无论那现实与真实之间有着多深的鸿沟。“我一天天更加地爱你。你是我的一切，为了你，为了我们永恒的爱情，我愿为你牺牲一切。”他对玛丽·泰莱丝如是写道，而与此同时，他又和弗朗索瓦丝·吉洛另建新居。为了寻求毕加索之所以那么吸引人的答案，我追溯到西班牙有关唐·璜的原始传说和印度牧牛神訖里什那的神话，为了得到这个爱神的爱，无论这爱是多么短暂或是被多少人分享，女人们情愿抛弃自己的一切。我终于明白了，毕加索一生中对女人们和许多男人有着不可抗御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因为他就是唐·璜和神奇的訖里什那，承诺给人们一条路，通往那拔高了的现实。结果许多人都迷恋于他，甚至准备为他付出生命和健全的心智——迷恋的高昂代价。

我感到震惊的是，他非常擅于利用宣传树立自己的声誉并进而编造自己的传奇。“一幅画只有通过看它的人才有生命”，他说：“而他们看到的即是有关这幅画的传奇。”我得承认，我喜欢他，喜爱他身上的矛盾：他既是一个满脑子农民迷信思想的人，又是一个耗资百万、豪放不羁的艺术家；既是一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又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共产党员。

但是，他的内心世界要远为丰富，远为深奥。他整个一生都投入了我们世纪的各种重大战斗，直到最后，他在这些斗争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对他走的这条道路感到失望。对我来说，这一认识是本书的转折点。我突然发现，毕加索的一生不仅是一个最天才的艺术家的一生，也不仅仅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有魅力的人的一生，而且，在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部20世纪的自传。它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纪，是世纪的缩影；同时，它也反映出他在人生和艺术上的全部痛苦。正是这些痛苦，使他成为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文化英雄和传奇的化身。

他是我们世纪渴望探索人类的性的极限的一位战士和抒情诗人。他身上渗透着原始的性的力量，没有一切压抑，同时他又诽谤妇女们是饕餮的魔鬼。他对上帝和神灵怀有深深的矛盾心理，反映出我们这个世纪另一方面的深奥。他拒宗教于门外，但又穿过窗子看着它回来。他宣传无神论，但同时又承认十字架上的基督，并在生命的每一重大时刻都使自己的作品回归到这个主题上。他又是我们这个世纪黑暗与残暴的主要见证人。在生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方向，于1944年郑重地加入共产党。在作品中，他用自己光辉的天才深刻剖析人的罪恶与时代的黑暗。像另一位表达我们不满的伟大的弗洛伊德一样，他深刻地、正确地看到了深藏在文明屋顶缝隙里的性苦闷、暴行和痛苦。这即是他的胜利。

他的悲剧在于，在艺术中他把毁灭奉为神明，在生活中又残忍地加以实践。他由于惧怕死亡，认为世界是罪恶的。他把艺术当作武器，在人的身上和画布上发泄他的愤怒，施行他

的复仇。他解释道：“一幅好画，应该有刀刃般的锋利。”当然，在形式上，还应该有一个好的关系。

仅有一个女人，作为人，也作为艺术家，还残存着并继续保持着锋利，她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当我刚刚着手本书的工作时，我曾请求会见她。她告诉我，她不想重新打开她生活中有关毕加索的篇章，婉言谢绝了。两年以后，她和她的丈夫乔纳斯·萨尔克博士在洛杉矶我的家中，和我共度周末。这个周末是惊人发现的开始。她突然作为“内部向导”，对我透露了许多事实和内幕。这些事实和内幕都是她自己有关毕加索的书中所没有写进去的，那本书出版时毕加索还在世，当时她觉得自己的孩子还太小，不便让他们知道全部真相。

她与我在洛杉矶、拉霍亚、纽约和巴黎交谈了许多个昼昼夜夜，她不仅非常真切地给我再现了她同毕加索在一起的几年生活，而且还让我看了有关的书信、文件和照片。这些极大地丰富了我对毕加索这几年的了解和认识。她要求我不要写死的毕加索，不要把他写成象征和传奇式的人物，而要把作为男人和作为艺术家的毕加索的个人遭遇生动地写出来。她对我说：“这不应是一本对毕加索有疏远感的传记。而你，阿莲娜，应该同他休戚与共，把他写活。”

为了写毕加索，就要找到一些真正了解他的生活遭遇的人。毕加索和玛丽·泰莱丝·华尔特所生之女玛雅·毕加索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就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毕加索，”她在伏尔泰车站她的家里，指着正走进居室的儿子和女儿说。毕加索曾拒绝同他的孙子们见面，我看着他们，一股悲凉的感觉从心中油然而起：他自己丢掉了多少充满生机勃勃的生活，以至晚年要在孤独与绝望中度过。

在穆更，即在离毕加索逝世不远的地方住着伊内丝·萨斯尔，在四分之一多世纪的岁月里，她曾是毕加索的女仆、管家和密友。她对我们的信件和电话从不回复，仅是在我到了她房门台阶时，她才终于同意和我谈起这个曾和她生活多年的人。许多年以来，他一直为她画肖像，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听着她重新体验她和毕加索的生活，我们两人都沉浸在这深挚的感情之中。在我会见她的最后一天晚上，她送我走到车旁，把一条她披戴的编织披肩解下来围在我的肩上，说：“一年中这种时候的夜晚很凉，你需要用它来防寒，而我已习惯了。”从她的表情中，我体验到她对毕加索生活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曾经说：“我整个生活都多亏了她。”现在我懂了这句话的含义。

“带着这条披肩。”当我们走到车旁时伊内丝说，我没有反对。“你戴我的耳环，”我说，给了她这付她早就喜欢的耳环。这种交换有着比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更重要的含义。

还有许多人，他们或短暂地、或长年地和毕加索有甚密的交往，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我所需要的个人认识和交往的细节。这些有助于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曾经是个符号象征的毕加索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毕加索。梅特尔·巴克·德·萨里亚克是毕加索一生中许多关键事件的律师，包括对弗朗索瓦丝·吉洛《与毕加索一起生活》一书以及她为孩子克洛德与帕尔玛合法化努力的诉讼；热内芙·拉波特在晚年还确信她是毕加索唯一真正的爱人；德·拉则美伯爵夫人还提供说，她曾在佩皮尼昂自己的城堡中拒绝过毕加索；还有希腊存在主义哲学家科斯塔·埃克洛斯，弗朗索瓦丝在离开毕加索时曾与他共同生活过；马乌里奇·图拉·拜拉里是他年轻时代的一个朋友，在他晚年仍经常拜访他；海伦·帕美琳是毕加索最后20年生活中少数几个亲密友人中的一个；毕加索的理发师是唯一能使他信赖为他理发的一

个人——为毕加索理发是一种极大的荣幸；毕加索的花匠，现住在法国南部毕加索最现代化的家中……所有这些人以及许多其它人为我提供了事实和认识的基础，正是在这基础上，我开始着手本书的写作。

对毕加索的生活发现得愈多，对他的艺术挖掘得就愈深，也就愈能将这二者高度统一起来。毕加索说：“重要的不在于一个艺术家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但是他的艺术本身就是他的一本完整的自传，记录了他所做的一切和他所是的一切。他的一生是命中注定的一生，超越了他个人的幸运与不幸。他经历了91年创造与毁灭的不平凡的一生，写他的传记，就不仅是在写一个人，而且也是经历了一次同这个人息息相通的感情上的波澜。

目 录

中文版序

作者序言

1. “我即国王” 1
2. “这就是生活” 21
- 3 进入成年 36
4. 热情与背叛 54
5. 新季节的女人 69
6. 系黑领结的天才 85
7. 女神与擦鞋垫 99
8. 米诺陶与缪斯 107
9. 内心的交战与外界 的战争 121
10. 通往绝对的窗口 140
11. 毕加索同志 148
12. “真理并不存在” 163
13. 失却天真 179
14. “没有人离得开我这样的男人” 196
15. 晚年的怪梦 211
16. “妈妈”与“阁下” 226
17. “这都是为了什么？” 237
- 尾声 248

附录

主要人物表 252

毕加索年表 255

图版说明

译后记

“我即国王”

他降生时，大家都以为是个死胎。

1881年10月25日夜11时15分，唐娜·玛丽亚·毕加索·德·路兹生下了一个既没有呼吸又不会蠕动的男婴。接生婆想尽力救活这个孩子，但没有成功，最后只好把这个没有生命的躯体弃置在一张桌子上，转向了产妇。唐娜·玛丽亚的丈夫唐·何塞·路兹和家族众成员在一起，目睹了这降生的一幕，对这个死产的婴儿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但是，何塞的弟弟唐·萨尔瓦多——一位医技高明的权威医生却不灰心。他俯下身子，吸足了一口雪茄，对准婴儿的鼻孔吹了进去，雪茄的烟雾顿时创造出奇迹，孩子活了过来。路兹家的第一个男性后嗣——后来取名巴勃罗的孩子，就这样，“一脸怪相，像公牛一样怒吼着”，来到了人世。

11月10日，他在圣地亚哥教堂受洗，被命名为：巴勃罗——这是他的已故伯父的名字；迭戈——这是他祖父和大伯父的名字；何塞——父亲的名字；弗朗西斯科·德·保罗——外祖父的名字；让·尼波木切诺——父亲的一位律师朋友、他的教父的名字；玛丽亚·德·洛·兰米迪奥斯——这是他的教母的名字。由于母亲唐娜·玛丽亚生他时难产，搞得身心憔悴，教母就代为哺乳。跟下来的一长串名字是：契波里阿诺与圣蒂西马·特林尼达德（圣三一之最）——根据旧风俗，最吉利的名字放在最后，似乎是在宣告：“前途无量，鹏程万里。”于是，他的全名就是：巴勃罗·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德·保罗·让·尼波木切诺·玛丽亚·德·洛·兰米迪奥斯·契波里阿诺·圣蒂西马·特林尼达德·路兹·毕加索。然而，这一大串姓名除了在马拉加市政厅的出生登记簿上出现过以外，大部分在他的生活中自行消失了。世人永远记住的只是这样一个名字：巴勃罗·毕加索。

孩子的已故伯父巴勃罗·路兹是个信奉上帝的人，一个神学家，马拉加大教堂牧师会的成员。他善于理解别人，理解他们人性上的种种弱点，也理解他们对人生的美好憧憬。他是在1878年10月猝然逝世的，当时年仅46岁。他的死对路兹一家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两个尚未出嫁的妹妹乔瑟珐和玛蒂尔达，是他一手抚养的；而已婚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家庭，

则把他奉为神明，他们是生活中有形的上帝。对何塞来说，这个打击就更大了。何塞比巴勃罗小6岁，是路兹家族的希望，家人都叫他“小宝”。他受哥哥的影响很大，处处离不开兄长的指教。他最大的爱好是绘画，他画画不是当作一种消遣，而是当作一种热情、执著的追求。何塞靠教书和卖画的收入是相当微薄的，哥哥就在经济上全力资助他，使他安心学画，无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何塞不断得到哥哥的鼓励 and 信任，从哥哥的教导中不断增强信心，提高审美眼光，这是他事业上的原动力。何塞曾经怀疑自己的才气，甚至怀疑自我的价值，怀疑身边的文化环境，因为照马拉加的世俗眼光来看，“画匠与饭桶是一个人，一回事。”于是，没有巴勃罗的支持和鼓励，何塞在绘画上不可能坚持下去。

巴勃罗·路兹知道，绘画之于弟弟，犹如神职之于自己，意味着一切。但巴勃罗并不像其他教师那样，笃守教义，冷漠无情，为了赞美神而不惜贬低人的价值。相反，他对自己的这个红头发的小弟弟关怀备至，胜如慈父。何塞呢，在马拉加市也是颇有名气的，绰号“英国绅士”。他身材修长，面孔白净，蓝眼睛，蓄着浓发，仪表堂堂。他具有一种令女人爱慕的魅力，但当他恶作剧时又有着出人意料的调皮。在这个小城里，他的一些恶作剧被人传来传去，说得有声有色。人们常爱谈论的，有这么一回事：有一次，他买了一只鸡蛋，当着卖蛋人的面生着喝了下去，然后从嘴里取出一个5比塞塔的银币。他一只接一只地喝生鸡蛋，一个又一个地从嘴里取出银币，卖蛋人看得目瞪口呆。他走开后，听见身后一阵打碎鸡蛋的声音，原来是卖蛋的女人敲开了自己所有的鸡蛋，想从中找到那些银币。何塞尽管喜欢搞这类恶作剧，但只是偶然为之。他更喜欢的是上咖啡厅，坐在那里同当地的艺术家们谈论绘画。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独自一人，精描细绘地画他的百合花和鸽子。他曾说，当他的朋友们走开时，他才最喜欢他们。他的一位祖辈（在他出生时还在世），曾在科尔多瓦附近的山中隐居了60年，对此他最能理解。

巴勃罗·路兹对性格孤僻的弟弟经常伸出援助之手，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保护弟弟免于生活的磨难和陷阱。但是现在，巴勃罗离去了，何塞孤身留在人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保护神，失去了自己唯一信赖的、给过自己以无限温暖和不断新生的亲人。这是何塞一生中最为痛苦而迷茫的时刻。

半年以前，他遇到了一位意中人。家里本来要他娶一位名叫阿美丽亚的女子为妻，但在她的家里，何塞却遇上了另外一位少女——阿美丽亚的表妹玛丽亚·毕加索·洛普丝。何塞对玛丽亚一见钟情，而玛丽亚也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位沉静的“英国绅士”。玛丽亚比何塞小17岁，外貌上仿佛与何塞不是一个种族：她长得矮小而又健壮，黑头发，黑眼睛，上唇边有个小小的痣。他们在性格气质上，也彼此相去甚远：她缺乏想象力，而这方面何塞却是游刃有余；何塞事事依赖兄长巴勃罗，而她则处事坚决果断，毫不犹豫；何塞待人处事坦坦荡荡，漫不经心，玛丽亚则以女人特有的敏感看待周围，对任何人都怀有戒心，决不轻易信任别人。她小时候心上就曾留有生活的创伤，那时她的父亲唐·弗朗西斯科·毕加索·加尔登索离家外出，说是去安的列斯群岛旅行，但从此一去不归。母亲唐娜·安尼斯·洛普丝·德·毕加索被遗弃了，一个人，茹苦含辛，把4个女儿抚养成人。玛丽亚的大姐已经去世，另外两个姐姐也都尚未成婚。三姐妹和母亲一起生活，住在马尔赛广场附近的一套简陋的房子里。

对于何塞的求婚，玛丽亚欣然接受。巴勃罗原打算在马尔赛教堂为这对有情人举办婚

礼，但婚礼没有办成，却在这个教堂举行了巴勃罗的葬礼，时间是1878年10月。于是，婚礼推延了。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巴勃罗的逝世使全家陷入极度的悲哀；二是何塞必须另寻经济来源，以支付结婚的各种费用。1879年7月，他在圣泰尔莫美术学校找到了一份助教工作，但薪水少得可怜。巴勃罗去世后，弟弟萨尔瓦多成了家庭的非正式的主事人，他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为何塞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唐·萨尔瓦多是这个地区的健康监察员，马拉加港口等保健院的主治医生，马拉加防疫中心的创建人，又是奥古斯丁圣母院和方济修道院的义务医生。他的社会工作担子本来够重的了，但他认为，替家庭排忧解难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利用自己在城里的影响，为哥哥找到了第二职业：在新成立的市立博物馆任馆长。1880年6月，何塞正式走马上任。最后，他积蓄了一笔结婚的钱。但婚礼还不能马上举行，因为给逝者服丧必须满两年，而且婚礼不能在马尔赛教堂举行，因为那里曾为兄长巴勃罗举办过葬礼，哀思永远难忘。

1880年12月8日，何塞·路兹与玛丽亚·毕加索在圣地亚哥教堂结为伉俪，新郎42岁，新娘25岁。婚后一个月，唐娜·玛丽亚怀孕了。就这样，单身汉何塞成了一名丈夫，而且不久，又会成为一位婴儿的父亲。

巴勃罗一生下来，他的世界里就是女人，而且全是女人。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唐娜·安尼斯，他的两位未出嫁的姨母艾拉迪亚与海辽朵拉，再加上女仆，一共5个女人娇容他，纵惯他，听从他的各种异想天开的摆布。娘家人全都搬了过来，她们有的是闲功夫哄孩子，把巴勃利托捧为掌上明珠。那年，马拉加闹葡萄虫害，毕加索母女们所拥有的葡萄园被毁得面目皆非，她们只好靠刺绣和编织勉强糊口度日。于是，唐·何塞担负起四个女人和一个儿子的抚养责任。一下子增加5张口要吃饭，日子并不好过。他有时要靠萨尔瓦多的帮助以解燃眉之急，但任何人都不会像他的大哥一样，随时会向他伸出慷慨无私的手。

灾难接踵而来，他的市立博物馆馆长的职务突然被解除了。这对已经在经济上相当拮据的何塞来说，打击太大了。他只好靠借贷度日，家境空前衰败。他向市政府表示：他无意竞争馆长的职务，但只要允许他干下去，即使没有薪金，他也愿意，希望市政府能够改变原来的决定；那样，他就可以一面为博物馆作画，同时也可以在那里画自己的东西，而闲居在家消磨光阴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是新任市政府恢复了他的职务，并给他增加了薪水，但无人替他清还债务。何塞一家搬到马尔赛广场的新居，房东同意接受他的画以顶逾期不付的房租，这使得捉襟见肘的日子多少宽松了一些。

巴勃罗一生下来，就是上帝送给唐娜·玛丽亚的一份厚礼。她从前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梦，但都被平凡的生活冲淡了，淹没了。而现在，她至少可以引以自豪的是，她有了一个出众的漂亮儿子。他那双机灵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十分逗人喜爱。“他是美的天使，也是美的魔鬼，”她后来对人说，“谁都想多看他几眼。”唐娜·玛丽亚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和生命都贯注到儿子身上，儿子使她变得固执、病态、神魂颠倒，儿子就是她的一切。

1884年12月，巴勃罗长到3岁时，唐娜·玛丽亚又生了一个女儿——劳拉。就在前几天，马拉加发生了一场地震，全城破坏惨重。年幼的巴勃罗把这场地震同劳拉的出生联系在一起，永远烙印在记忆中。初震刚开始，唐·何塞就立即奔回家，把全家人转移到安东尼奥·蒙诺兹·德格兰的寓所。安东尼奥是他的密友，也是他绘画上的导师，当时正在罗马。友家的房间跨度比较小，整所房子是石头盖的，相当结实。何塞能急中生智，作出搬家

的决定，如果不是出于理性的话，就是长期受安东尼奥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直觉感和安全感。

巴勃罗对全家出走、大地震动的那一瞬间一直记忆犹新，他后来回忆道：“母亲头上包着一条方围巾，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个样子。父亲从衣架上抄起一件斗篷，匆匆披上，抱起我，把我包在斗篷里，只有头露在外边。”他们在安东尼奥的寓所度过了焦心如焚的日日夜夜，余震一直没有停息，而唐娜·玛丽亚很快就要临产了，弄得他们连圣诞节都没过。3天以后，即12月28日，劳拉生下来了。按毕加索后来的回忆，她是“在大劫大难之中”生下来的。对这个惯于留心观察一切的小男孩来说，那场地震是最大的劫难。

安东尼奥从罗马回来时，何塞一家还在他的寓所住着。国王阿尔蓬索七世也恰好在这时抵达马拉加，国王是在地震大破坏之后，前来这个城市视察的。马拉加市到处旗帜飘扬，恭候国王的驾临。安东尼奥的到来，引起巴勃罗强烈的好奇。他对这位来客上下打量，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留意观察，巨细无遗。以至57年后，安东尼奥当时的尊颜及到来时的情景仍清晰地留在他的印象中，使他敬畏之心油然而起。他说：“简直无法想象，无法置信，……那么多马车列队前进，上边坐满了戴大礼帽的绅士”，他还以为那些马车和绅士都是陪伴安东尼奥衣锦还乡的。同样，他还坚信，全城五彩缤纷的旗帜都是为了欢庆这位伟大画家的凯旋。对年幼的巴勃罗来说，那的确是他生活中最为激动不安的时刻，他亲眼看到这位曾使父亲当作偶像来崇拜的画家，享有那么多的荣耀，简直“无法置信”。后来，他把安东尼奥形容为“桂冠画家”。至于他回忆中的一些细节，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在这个3岁孩子的心灵深处，绘画与荣耀已结为一体。

他还不会说话时，就会用图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在纸上画个螺旋形的东西，意思是想要个“长长的、螺旋形的、粘满糖粒的、在西班牙每个小食品摊上都能买到的、热甜饼”。一个尚未学会说话的孩子，竟懂得如何用图画来表达自己的想吃糖饼的愿望，简直是个奇迹。

4岁时，他开始剪纸。剪各种动物，剪花卉，剪想象中的各类奇异的东西，剪完就把它贴在墙上，就像中国的皮影戏一样。他还剪出一张酷似姨母海辽朵拉秘恋中的情人像，把它贴到墙上，使全家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的“秘密”，爆出一阵阵大笑。海辽朵拉捂住自己的耳朵，样子十分尴尬。除了剪纸，他有空就画铅笔画。他呀呀学语时的第一个字就是“北”——“铅笔”在他的儿语中就变成了“北”。他喊着要：“北，北”，于是母亲就给他一支铅笔。

巴勃罗像所有的魔术师一样，需要观众，他的小表妹康查和玛丽亚是他的首批观众。她们看他如何从一张白纸上变出各式各样的玩意，看得着了迷。她们冲他喊道：“我要一只纽芬兰狗！”“我要玛蒂尔达阿姨家的那只公鸡！”“你们还要什么？”他问她们，“你们要我先变哪个？”玛丽亚要巴勃罗为她剪一些小毛驴。于是他开始剪了，有的从驴背开始剪，有的从驴腿开始剪，有的又从驴耳朵开始剪，不管从哪儿开始，也不管是用铅笔还是用剪刀，最后变出来的小毛驴正是她们所希望得到的，带着一副滑稽样。

上学对巴勃罗来说，压根儿就是一种折磨。他是个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孩子，最不喜欢各种校规，而且总是违犯纪律。不管什么时间，只要他喜欢，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窗口，用手一个劲地敲玻璃，希望姑父安东尼奥能够看见他。安东尼奥这时已娶了何塞的一个妹妹，家就住在学校对面。他每次看见小侄儿在那里敲窗户，就来到学校，带他出去散散

步，使他从百无聊赖中解脱一会儿。不过，他每次都是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才来，因为这是按巴勃罗的要求做的。在小巴勃罗看来，“一”是最小的数字，当然也就意味着等待的时间最少。使巴勃罗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一小时”要等这么久，就好像等了一辈子。安东尼奥所做的是他所要求的，但不是他实际所希望的。

他的反叛精神是从他开始感到孤独时滋生起来的。自从妹妹劳拉取代了他在母亲心中的位置，他就把全部感情转向了父亲，把父亲当作崇拜的对象。他喜欢看父亲作画，后来，他经常对朋友们讲述父亲画过的“一幅绘有鸽棚和无数鸽子的巨画”。他说：“想象一下吧，一个装着数百只鸽子的鸽笼，还有成千上万只鸽子……”后来在马拉加博物馆发现了这张画，根本谈不上什么“巨画”，而且画中也只有9只鸽子。巴勃罗如此美化这幅画，目的不过是要美化他的父亲唐·何塞。

他一刻也离不开父亲，仿佛父亲不在身边他就无法呼吸一样。他唯一肯松开何塞手的时候，是当他们走到了校门口，他向父亲讨取一些信物，以免忘记下学时回来接他。信物就是保证，东西倒不在乎大小，什么都行，如画笔，手杖，或一只用来作绘画模具的鸽子标本。巴勃罗经常把这只鸽子标本放在书桌上照着写生，对课堂里的教学全然不去注意。他日后回忆说：“父亲如果能把手杖或鸽子留给我，我就可以肯定他会回来的。但是比起手杖来，我更喜欢要他的鸽子或画笔，因为我知道，他缺了任何一样东西都无法工作。”

父亲想尽办法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得让女仆卡门·门朵扎送他上学。卡门是个“长胡须的、男人气的”女人，巴勃罗说什么也不干，大哭大闹，父母只好给他转学。新学校是一所名叫“圣拉菲尔”的私立学校，“光线明亮，通风良好，全市第一”，又是家庭的一位朋友开办的。有这层关系，校长自然同意接收巴勃罗。家里人都认为，在这样的好学校里，孩子一定会很快活。但实际上，他整天游手好闲，“像条小狗”似的围着校长太太的裙子转。校长对唐·何塞说：“你若打算要儿子跟我太太学做饭，或是学哄孩子，那么一切照旧好了。但你若是想让他多学点知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要让他有所转变。”

但是，转变谈何容易呢！巴勃罗最怕寂寞，厌恶学业，十分任性，心里有个什么主意，就会想方设法实现它。如果他的小主意在大人身上施展不成，他就会装病，有时“病”得很重，母亲要把他接回家，照顾上一整天。而有时，他也真的病了。有一次他得了一场病，在家休息了好长一段日子。等这位小勇士病好利落该重返课堂了，他便借机向父母勒索到许多额外的特权。特权之一是，让女仆替他拿鸽子，他好画写生；另一个特权是，尽家里经济许可，给他请个家庭教师，教他画画。

在学校，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教室的挂钟上，眼盯盯地看着指针的移动。他盼望挂钟的指针走得快些，快点走到一点钟，那时父亲就该来接他回家了。他日后回忆道：“简直不可思议，我就像白痴一样凝视着那挂钟，抬着眼，歪着头……像个大白痴。”他不论如何努力，还是掌握不了基本的读、写、算。“一加一等于二，”他回忆道：“二加一等于……我怎么也算不下去。别以为我不用功，我实际上已经够下功夫了。我曾一再对自己说：要集中精力。想想看，二加一等于……等于一点钟……啊！不对。我又得从头算起，可是很快就又走神了，脑子里总是想着回家的钟点，想着家里人会不会来接我。我时不时上趟厕所，或到什么地方呆会儿，对请假我是百请不厌。”他在课堂上走神是常事，有时还会想着给老师画个像，